

## 在人道工作中直言不讳 还是保持沉默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 (Jakob Kellenberger) \* / 刘擎\*\* 译

正如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 (Michael Ignatieff) 在《艰难抉择》<sup>1</sup>一文中以及乔纳森·本索尔 (Jonathan Benthall) 在《灾难、援助和媒体》<sup>2</sup>中所展现的那样，对于一个人权组织而言，是否应该公开并且谴责对于国际人道法的违反以及其他的不法行为，是否应该指出那些应当承担负责人的名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公开和谴责？这从来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情况更是如此。这种局面的形成有诸多原因，我必须逐一加以解释。时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公开或发表的声明也支配着政治的角逐。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无意卷入政治争辩的唇枪舌辩中，但这些公开或发表的声明仍旧展现了在政治利益和人道关注之间存在冲突的纷繁世界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如何开展它的工作的。因此本文的主题即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洞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开展的工作以及它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开展这些工作的。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特殊性

国际上有众多的人权组织，这些人权组织无论从运作方式还是从分布的地域而言都风格迥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便是这其中的一员。国际人权组织数目的迅猛增长是晚近人道环境变化过程的一部分。然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拥有 12,000 名工作人员，其中有超过 11,000 人分布于武装冲突或局势紧张地区的第一线，它是一个有着众多独特特征的庞大的组织。

在国际人道法的条约中，各国都明确而排他性地，抑或允许其协同其他非特定的人权组织，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特定的使命。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虽然不同于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但它仍不能像其他非政府组织那样自由地作为或不作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核心使命就是保护和帮助世界范围内的武装冲突和国内战乱的受害者。它的工作既不局限于特定的地区也不针对特定的人群。在当今全球互通信息的时代，这意味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所作所为代表着它自身的形象，尤其是它在一个地方公众面前所说的一切，都会在顷刻之间传遍工作地方以外的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一点决定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了适应当地环境，也许也为了适应特定态度，要对其交流方式加以限制，而这种限制也是非常务实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特色在于它以同武装冲突的受害者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为其根本使命，并且为了这一宗旨而不懈追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先要设法接近武装冲突和国内战乱的受害者，进而对他们进行保护和提供帮助。其他除了安全以外的一切考虑都严格地服从这一宗旨。为了实现这一宗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保证它能在冲突地区存在下去，并且保证它所展开的工作能够为可以对战事及人道后果施加影响的各方所接受。也只有这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才能够继续它在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使命。尽管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接近特定地区有诸多的困难，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是一如既往地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甚至在有些冲突地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唯一可以被接受的人道组织。

---

\*作者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4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sup>1</sup>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我们讲述的故事：电视与人道援助”，载乔纳森·穆尔 (Jonathan Moore) 编著：《艰难抉择：人道干涉中的道德窘境》，罗曼—利特菲尔德出版社，波士顿，1998 年，第 287~302 页。

<sup>2</sup>乔纳森·本索尔 (Jonathan Benthall)：《灾难，援助和媒体》，I.B.桃利斯合作有限公司，伦敦/纽约，1993 年。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环境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工作的环境是战区和冲突爆发地，它们在近些年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撰写本文时同样要牢记这一点。在众多的新型冲突中，绝大多数是国内武装冲突，并且以无视法律以及叛乱者难以逮捕正如同其难以接触一样为特点。恩岑斯贝格尔（H.M.Enzensberger）<sup>3</sup>在 1993 年曾写道：在内战中，任何抽象并且理论上复杂的正当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虽然他指的仅是巴尔干地区，但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均普遍存在。并且，自 17 世纪以来已经销声匿迹的私人军阀又开始在许多国家政权瓦解的冲突地区有所抬头。<sup>4</sup> 尽管瓦伦斯坦(Wallenstein)的交替安排计划似乎比席勒(Schiller)的简单一些，但将当今的复杂情况划入国际人道法特定的类型仍是相当困难的。虽然现存法律是以国籍为出发点，但是特定的种族在当今冲突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 当今冲突的特点

与当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相联系的武装冲突大致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 (1) 战区情况的不明确性；
- (2) 世界范围内沿着错误路线极化、激进化发展的趋势；
- (3) 全球范围内的内战多年来以武装冲突为特点；
- (4) 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规制的削弱，不仅带来了有目共睹的利益，同时也扩大了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活动范围；
- (5) 失去控制或即将失去控制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行使国家权力或者为人民的生存提供所需的基本设施的中央政府；
- (6) 全球反恐战争；
- (7) 接近武装冲突受害者的困难增多；
- (8) 人道援助被滥用或被彻底拒绝的风险加大；
- (9) 对组织战地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威胁在增加；
- (10) 类似情况下在适用标准方面存在双重性。

所有这些都不是新特点。然而，恐怖主义以及对于恐怖主义的打击已经呈现于世人面前；非国际武装团体的作用日益加大。我个人认为这些还是比较新的现象。

### 冲突的诸种原因

当今武装冲突的特点多数是以武装冲突的产生原因为其标志。以下就是曾经且依旧存在的几种武装冲突的产生原因：

- (1) 争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团体和个人的驱使。
- (2) 失控的或即将失控的国家无法再维持法律和秩序。
- (3) 对于原料的争夺。
- (4) 在国家机制面临崩溃，或在一个或两个以上少数群体受到歧视或他们感到受到歧视的背景下所产生的贫困和社会压力。弗朗索瓦·蒂阿尔（François Thual）对于这种爆发式的原因结合体尤为关注。<sup>5</sup>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对武装冲突所作的有益分析的评论中曾经指出，<sup>6</sup> 在主张群体身份和地位的冲突中，应该注意紧张局势加剧以及自下而上、自发生成的程度。贫困与战争的偶然联系必须从两个角度加以观察。换句话说，武装冲突也是贫困和其

---

<sup>3</sup>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有关内战的预测》（Aussichten auf den Bürgerkrieg），祖尔坎普,法兰克福,1993年,第20页。

<sup>4</sup> See Herfried Münkler: *Die Neuen Kriege*, 6th edition, 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2003 especially pp.59ff.

<sup>5</sup> 弗朗索瓦·蒂阿尔：《法律冲突确认》（Les Conflicts identitaires），艾利普西斯出版社，巴黎，1995年。

<sup>6</sup>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新世纪》，阿巴克斯(Abacus)出版社，伦敦，2000年。

他悲剧产生的主导原因。

(5) 世界范围内的沿着错误路线极化、激进化发展的趋势，加上与之相适应的抗击暴力自愿性的减弱或根本缺失。

(6) 正如我们可以从 2001 年 10 月在阿富汗看到的那样，恐怖主义的空前规模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恐行动。

(7) 一场战争可以导致未来的战争，最重要的是，武装冲突中会有对于国际战争规则的彻底违反。

尽管这些听起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并不能说武装冲突的爆发通常需要各种原因的共同作用。对于主要和次要原因、真实和表象原因的区分还是非常必要的。

### 被削弱了作用的国际人道法

鉴于这些观察到的情况和预期的发展状况，战争中非国家集团的重要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会消失。因为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规制的削弱愈发地增加了非国家参与者的行动的立场和能力。同样，与这些所谓的新冲突相关联的各种现象的迅速消失也是不大可能的。我这里指的是普遍的国际战争法规则的弱化和对冲突各方约束规则的整体缺乏，尤其是平民越来越频繁地成为被袭击的目标。在任何地方，国际人道法的基石之一，即：战斗员和平民的区别正遭到削弱。一些非政府武装团体对于国际人道法的彻底漠视，以及在打击恐怖主义背景下为形成特定规则所做的努力等，都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面临的新挑战，即新的交战势力和新的作战方式。<sup>7</sup>

当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展它的大部分工作的。在许多地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能再指望人们对国际人道法规则的高度自觉性地接受，也不能指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它的工作原则能够为人所了解和尊重。在许多冲突地区，我们仍有可能受到怂恿而认为：我们可以凭借自身的独立性、公正性以及无偏见性而获得人们尊重。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想获得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原则的确信，首先必须通过连贯的并且可以预见的行为，通过不厌其烦地解释我们所做的工作。这是很必要的。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的法律基础

国内武装冲突成了家常便饭这一事实还有另外一个后果。同国内武装冲突相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中开展其活动更具有国际人道法上的基础。因为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对于国家主权的考虑会尤为突出。若国家批准了相关法律文件，那么在国际冲突中就有义务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望因受战争牵连而被拘禁的人，如探访在伊拉克被拘禁的战俘或平民。<sup>8</sup>而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国家便不存在这种义务，比如像发生在苏丹的冲突。<sup>9</sup>在存在协议的情况下，需要就协议进行磋商，这些协议通常是暂时的并且是可以被终止的。这些国家只有确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会将其在人道活动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公布于众的情况下才会同意就这些协议进行磋商，并且也只能同有关当局进行秘密磋商。毕竟，允许一个组织定期地探访囚犯并同他们进行私下谈话，不能不说是对其国家主权的削弱。

### 信息处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环境和它的工作方式使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以掌握很多情况。红十

---

<sup>7</sup>国际红十字会在其第 28 届国际会议上提交的报告——《国际人道法以及当代武装冲突的挑战》中，曾针对国际人道法以及当代武装冲突的挑战的趋势做出回应，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86 卷），853 号，2004 年 3 月，第 213~244 页。

<sup>8</sup>参见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26 条，以及关于战争期间平民保护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143 条。

<sup>9</sup>四个日内瓦公约的第 3 条均规定了相同的内容，即：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非国家间武装冲突中采取行动的权利。除了一国国内骚乱以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在任何一国国内的武装冲突中为交战各方提供帮助。《国际红十字会行动规则》第 5 条规定了相类似的采取人道行动的权利。

## 红十字国际评论

字国际委员会首先通过它的人道活动获得这些信息，并且将这些信息唯一地用于人道活动。鉴于这些信息通常非常敏感，政治上很微妙，可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因此考虑欠周的措辞大有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卷入政治争论的风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处的国际地位及其对于公开呼吁和声明的慎用，使它具有相当大的权威。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避免发表公开声明和呼吁，即使在情况类似的其他地方曾经发表过这种公开声明和呼吁。

基于这一理由，是直言不讳地说出真实情况还是保持缄默就成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其人道工作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直言不讳的重要性，或者说是发表公开声明的重要性，有时候被夸大，有时候又被低估。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年代，是一个多言多语、一个过快得出评判、一个易于表达观点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直言不讳的重要性往往被夸大了。

### 人道行动和作证之间的冲突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公开的声明和呼吁中的地位常常是有争议的，而且有时还会导致激烈的争论。已知的最好例子可以追溯到 1942 年的秋天，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拒绝对平民保护作公开呼吁，它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的意见其实没有注意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所以拒绝发表公开呼吁，是担心它会因此而无法接近其正给予帮助的大约两万名联盟部队的战俘。这些批评的意见也没有注意到：这种公开的呼吁究竟能否在何种程度上改善平民特别是集中营中囚犯的境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1988 年对让·克洛德·法韦兹(Jean-Claude Favez)的一本书的评论中，<sup>10</sup>重申了它对于此种公开呼吁有效性是否存在的质疑。<sup>11</sup>

有一些专家能充分意识到决定开展人道行动与公开作证之间存在的冲突，并且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特定时刻保持缄默视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历史上的转折点。“为了持续这种援助活动，红十字会做出了拒绝说出其所了解的灭绝种族集中营里的情况的灾难性决定。”<sup>12</sup>

然而对于这一真正的窘境，即除了站在一个无可否认的重要的道德立场之外，在特定情况下公开呼吁究竟能够得到什么？以及有关公开呼吁对于现存人道活动的影响的思考，都还是远远不够的。

特别是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一个人道组织的立场来讲，关于直言不讳还是保持沉默这一问题，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会产生意义深远的后果。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否可以继续它的人道工作，而且还会对该组织的形象以及它为世人所接受的方式产生影响。对于某些集团而言，这个是直言不讳还是保持缄默的决定，也许比一个人道组织究竟做什么更加举足轻重。

### 限制发表公开声明

关于发表公开声明，毫无疑问，如果同其他国际组织相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仍被认为是相当谨慎或至少是比较保守的。然而，考虑到不同组织有不同任务和活动，这种比较可能会产生误导。这种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理解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在巴尔干战争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发表的许多公开声明和呼吁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公众对于某些正在发生的情况是没有疑问的，以下就是这方面的两个例子。

在 1992 年一份对波黑(Bosnia Herzegovina)交战各方的公开呼吁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谴责了对于无辜平民的拘禁和非人道待遇，同时呼吁各方采取一切措施，特别是与日内瓦第三、第四公约相符合的人道措施。<sup>13</sup>对于平民所处的极其恶劣的困境的描述也成为 1995 年 7 月对叛乱者的

<sup>10</sup>让·克洛德·法韦兹：《红十字会与毁灭》，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1999 年。

<sup>11</sup>让·克洛德·法韦兹：《不可能的使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集中营与纳粹的强迫迁移》，派也特出版社，洛迦诺，1988 年，第 378 页。

<sup>12</sup>让·克里斯托菲·吕芬(Jean-Cristophe Rufin)：《人道行动的前景》，加利玛德出版社(Gallimard)，爱符勒斯(Evreux)，1994 年，第 74 页。

<sup>13</sup>“国际红十字会与前南斯拉夫战乱”，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74 卷)，第 290 号，9/10 月

一份公开呼吁的核心内容。这份呼吁要求叛乱者通过具体的措施达成人道共识，诸如帮助恢复萨拉热窝（Sarajevo）和周边地区的供水。

第二个例子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 1998 年 9 月科索沃危机的公开声明，<sup>14</sup>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声明中着重提到了平民的恶劣境况，并且强调确保平民安全以及对平民给予尊重的责任在塞族（Serbian）当局一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督促阿尔巴尼亚政府和科索沃解放军尽最大努力结束屠杀。

我为什么要举这些特殊的例子呢？因为这些例子表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非回避发表公开评论，而是避免发表单方面的或至少是偏重于冲突某一方的公然谴责。虽然这种方法有时会遭到批评，但它清楚地表明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要关注的问题是：公开声明切不可削弱人道援助的作用。尽管我没说发表公开声明就一定会产生使提供人道援助受阻的效果，但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就足以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谨慎行事。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公众提供关于战区人民生活疾苦状况以及当今冲突的复杂性的信息是很重要的。并且，还有很多领域能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不损害其开展活动所必不可少的保密性以及不必匆忙做出评判的同时向公众公开信息。

### 首要任务：接近受害者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因其将履行人道使命视为首要任务，没有向公众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而受到批评，更有人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定有很多东西要说却没有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每天都面对着各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情况，有些是对国际人道法的严重违反，工作人员们了解最偏远的监狱、战俘集中营和拘留中心的状况。很少有其他组织能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了解战区 and 冲突地区内的各种各样的真实情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会对武装冲突的一方进行单方面的谴责。在这样一个年代里，即迅速地做出评判并且做作地表达关切和谴责得到高度评价、而不论其对于情势是否具有真正影响力的年代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谨慎也许会疏远一些人或烦扰一些人，因为这种谨慎与人们通常所期待的不相适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特征其实并非是过分谨慎而拒绝发表公开评判和做针对单方的谴责。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不愿意发表公开声明。它保持缄默的原因是双重的：一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想冒因为发表公开声明而失去接近冲突受害者的风险；二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这种公开的声明能在多大程度上动员舆论的力量持保留态度。与此相联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贝尔法拉（Biafra）战争中对对其工作人员发表公开意见加以约束和限制使得其一名工作人员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在 1971 年找到了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这名工作人员感到，正如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无国界医生组织圈内人士所熟知的那样，这位“年迈的女士”（这里诙谐地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年迈的女士。——译者注）在自由表达意见方面受到了太多的限制和约束。

最应当予以注意的是措辞方面。是否参与各种公众争论的决定，以及如果决定参与的话，应该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参与，的确都需要仔细地斟酌。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谈到语言和谈话时讲道：“我们自己很少主动对话，多数都是我们被卷入或拉进对话中。”<sup>15</sup>

除了我们自己的意愿以外，语言和情景也决定了我们会说些什么。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人道组织，它几乎总是在情感和非理智的环境中工作，因此需要考虑到语言和情境这些重要方面。我们不但必须明确我们想说些什么、不想说什么，我们还必须认真地考虑一下该在何时何地参与公众讨论。

---

刊，1992年，第488~493页。

<sup>14</sup>红十字会关于科索沃局势的公开声明，发表在《红十字国际评论》（第325卷），1998年12月，第725~728页。

<sup>15</sup>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Crossroad，纽约，1990年。

### 公开呼吁的补充作用

只有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它保守秘密的工作方式毫无效果且不再能够为冲突受害者提供进一步切实的保护和帮助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才会发表公开声明和谴责。这是一个事实，同时也是一项规则，也许再没有比这更能充分地阐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公开声明和谴责的关系的了。<sup>16</sup> 要做一个最佳选择，发表公开谴责只能排在第二或第三位。换句话说，作为一项规则，只有当其认为公开谴责或呼吁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实际的人道援助更有利于保护冲突受害者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才会采取发表公开谴责或呼吁。在估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做的声明的意义时，有一点需要牢记于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动员公众舆论的效果未必一定能够令人信服；尽管这种效果不可能被具体地得到证实，这点也不能否认。

也许很难有比 1994 年 4 月 28 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发表的公开呼吁更为紧迫和激烈的了，这一声明是在卢旺达大屠杀开始三周后做出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所有有关国家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立即结束这一大屠杀。为了避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大屠杀中罹难，它最开始并没有使用“种族灭绝”一词。然而，就是用系统性的大屠杀这一迂回的说法，人们也没有对究竟发生了什么产生怀疑。即使有对情况产生怀疑的人，4 月份大量的媒体报道中所使用的“纷乱”、“大屠杀”、“人类悲剧”等各种用词也都充分地呈现了真实情况。<sup>17</sup> 然而尽管有大量媒体清晰的披露，这些公开声明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国际社会的迅速反应。直到 7 月 22 日联合国安理会允许法国开展人道援助工作、直到两个月后联合国执行 5 月 17 日通过的决议，才将联合国驻卢旺达救援团的工作人员增至 5500 名。<sup>18</sup>

举出这个例子，并不是为了指责国际社会对此反应的速度之慢，而是想提醒那些主张迅速地予以公开控诉的人，通常人们仅仅只满足于控诉。在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当今人们异常地强调“特别关注”。问题是，通常只是呼吁别人去做些事情，除此之外毫无意义。然而那些受害者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 help 和保护。在阐明这一观点时，我并不是低估为那些没有权利同时又没有机会表达自己观点的受害者们声讨权利的作用。只有那些知道能接近武装冲突的受害者是比除了安全因素以外都重要的人，才会了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发表公开声明问题上的立场。当我们作首要选择时，是没有任何折中办法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样还设法在其所承担的责任和采取行动的能力之间维持一个合理的平衡。请允许我阐释一下恩岑斯贝格尔（Enzensberger）的评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无意扩大通过为自己和他人制定道德标准，从而减小他们自身责任的阵营。<sup>19</sup> 在一个任何行为包括说话都可能被用于各色用途（包括娱乐）的世界，设立首要选择也许看起来非常武断，即使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也是不言而喻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没有标榜自己是人类道德良知的体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知道道德良知不能取消武装冲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真正想做的是在其权力范围内，尽一切的可能去帮助战争受害者，并且防止任何可能使接近战争受害者受到阻碍的情况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会被视为在艰难条件下维护最低限度的文明标准。发表公开评论的利与弊都必须以这些首要的考虑为衡量标准。

有两件事我们切不可忘却：一是“直言不讳”或“保持沉默”都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安全息息相关；二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发表公开评论的空间，并且这种公开评论并不会使人道活动陷入困境，如在众多场合下传播国际人道法知识、提出新的发展建议。例如，仅在哥伦比亚一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曾组织了 1340 次论坛和会议，60,000 多名参加者来自不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sup>16</sup> “国际红十字会在违反国际人道法中采取的行动”，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221 卷），3/4 月，1981 年，第 76~83 页。

<sup>17</sup> 关于 1994 年国际红十字会在卢旺达的活动的详细情况，载 <http://www.icrc.org/web/fre/sitefreo.nsf/html/Rwanda>，上次访问时间为 2004 年 7 月 17 日。

<sup>18</sup> 参见 1994 年 6 月 22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929 号决议。

<sup>19</sup>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内战》，伦敦，1994 年。

### 公开性和保密性

到此为止，我所谈到的都是关于公开评论。然而，发表公开评论当然不是唯一、而且也不一定是最有效的评论方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经常大胆地实话实说：当他们遇到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情况时，就会与交战各方——通常是偏远战区的部队指挥官们进行沟通和交涉，向他们解释应适用的法律并要求这些法律得到遵守。这是需要胆量和魄力的。这样做所面对的人身危险远比在远离冲突地区发表公开控诉要大得多。

此外，不对外公开的监狱报道中也包含它就改善拘留环境的建议。这些建议要同有权当局进行探讨，在其下一次探访狱囚的时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还要核查已有哪些建议被付诸实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草拟有关战斗行为的情况以及在军事行动中平民在多大程度上予以保护的评估，并递交给交战各方。换言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公开场合的沉默并不意味着它对自己所看到的绝对闭口不言，或者它不会大胆说出其所看到的从而促进人道状况有所改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最后，同发表公开谴责的作用相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许更相信不公开规劝的影响力。

并且，在关押拘留地或冲突地区发生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情况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更愿意采取这种保密的工作方式。只有当不断重复的保密方式不能制止对于国际人道法的违反时，或者说至少人道状况没有改善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才会考虑采取公开的方式。然而，即便如此，也只有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确信公开的方式对受到关注的人们有所帮助时才会选择公开。事实上，这是一个当任何在战区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所采取的改善人道状况的方法都已经用尽之后才会采取的环环相扣的过程。

首先，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保证在我们介入的过程中避免使我们在战区的工作人员处于不利境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关塔那摩监狱 2000 年 2 月、2003 年 5 月和 2004 年 1 月状况的比较公开的声明就采用了这种方式。<sup>20</sup>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公开情况之前，自然还要估量一下公开情况能够期待有多大的事实上的改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公开反对、震惊的表达以及所采取的谴责的姿态通常只会产生不太大的效果。

鉴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所看到和所经历的一切，他们常常被要求必须努力克制，不能仅仅是出于义愤就轻易地表达观点。向公众们作通常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关于 A 国×监狱骇人听闻的状况的描述可以满足那些热衷于新闻的人，并且这种谴责也可能改善受害者的境况，至少从短期效果来看是这样。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下一次被拒绝接近受害者。这样就无人能够想象得出，当无法再次探望这些受害者时，这些受害者的安全状况究竟如何。此外，公布情况的决定不能仅针对某一特定情况，必须要考虑到对其他状况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公开了关于 A 国的情况，是否意味着我们会被拒绝探望处在 B 国或 C 国的受害者？

保持机密通常要求相当多的纪律和一定程度的谦逊。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由于太难揪出并谴责那些始作俑者，常常一点信息就被过分地夸大了。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说出在探访了位于巴格达附近的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德监狱后所观察到的人道状况的改善，<sup>21</sup>就很好地回应了那些所谓保密的方式无助于对人道状况做出补救的评论。不论评论说了什么，我从不怀疑：早在那些不人道的、毫无人性的、骇人听闻的虐囚照片公开之前，人道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即便不是全部地但至少是部分地要归功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坦诚而直率的要求。

---

<sup>20</sup>参见 2002 年 2 月 9 日第 02 / 11 号，2003 年 5 月 28 日第 03 / 36 号，2004 年 1 月 16 日第 04 / 03 新闻稿。

<sup>21</sup>2004 年 5 月 7 日的《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大篇幅地引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 2004 年 1 月所作的其探访伊拉克监狱情况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是在 2004 年 2 月提交给联军的。此份报告为机密文件并且仅提交给所提交的当局，报告明确地声明：未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同意不得部分或全部披露。编纂并提交报告构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访世界范围内监狱的标准程序的一部分。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媒体

有人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公开的民主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如果动用公开化这一杠杆将会更有效地带来变化。这些人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大部分是由媒体塑造的。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应该采取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运作和沟通方式。

自然而然，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沟通方式而言，应该将媒体对于某一特定冲突场景的关注度考虑在内。然而，无论媒体的报道力度有多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任何战区的工作范围通常都远远超过媒体的聚光灯所达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来到暴力受害者的身边为他们提供帮助。透露给媒体的报道表明囚犯们感到他们可以信赖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的私人谈话，谈他们在监狱里受到的非人待遇。报道也表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人道状况方面的努力工作中是直言不讳的。保持机密不等同于无所作为或是姑息。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伊拉克监狱状况的公开谴责能否产生如在世界范围内公开虐囚照片一样的效果，仍是个争议之中的问题。关键在于，从长远和特定某一事件的角度来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其已经经受住审查和考验的监狱探视程序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受害者们是有效并且是有益的，其中包括报道的保密性。其对于伊拉克囚犯境况的意见表述也是坚定而不受限制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比已经谈到的、可能想到的要更紧密和复杂。它和媒体的工作人员经常在同一环境之中工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媒体对于武装冲突的报道中有切实的利益，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这些冲突将会被人遗忘。例如，在卢旺达大屠杀的头一个月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帮助 12 名记者进入吉加里（Kigali），虽然这些记者两天后又都离开了。

提醒媒体注意战区的状况和普遍的人道关注，如对拆除未爆军用器材承担责任，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讲具有重要的可操作性。当国家没有可以清楚地加以确定或识别的共同利益时，只有动员公众舆论的力量才能说服政府采取行动。这方面，媒体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此外，只要是跟踪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2004 年上半年对相关敏感问题的公开声明的人都会知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不如有人指责的那样保持着沉默。

### 重要的是考虑周全

也许有人认为限制发表公开声明和控诉无可指责。但有一些问题我不想回避。如果过分限制对于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公开谴责并追究其责任，是否最终会使作恶者逍遥法外。有时甚至会被说成与违法者共谋。难道同默默无闻地协助提供人道援助相比，发表公开声明或谴责以及其所引发的行为，能够更普遍而持久地改善受难人群的生存状况吗？最重要的是，如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公众面前采取了大胆而富于挑战性的方式的话，又是否有可能导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被完全赶出其正在开展人道援助工作的国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不一定会被强迫离开，并且每个冲突地区的情况都要予以区别对待。然而人道工作受到严重阻碍可能性的存在就足以使其在公开情况之前对可能导致的结果三思而后行。然而，总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即除了直接说出真实情况外再无其他的选择。如果考虑到可能的后果，那将是一个最难以做出的选择。

在一个不尽如人意又一成不变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大规模地公开谴责从长远来讲可以比人道援助更有利于促进日趋人权状况的发展。然而，我不认为人道援助会延长战争。如果人道援助会防止形势的恶化，恶化往往会促使国际社会或国内的力量采取决定性的行动，那么这种人道援助可能会间接地延缓和平的到来。然而，我同样也非常怀疑公开谴责会引起国际社会或国内力量作出反应。发表公开谴责很可能只产生微乎其微的作用或根本不产生作用，同时又剥夺了许多人得到人道组织援助的机会。

将保持接近受害者视为绝对的首要任务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作用，即一国的军阀或独裁者得到了比他们本应得到的更好的公众形象。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形：当今有许多组织



都积极地对虐待等发表公开谴责。然而，正是因为这些组织没有和相关国家开展人道活动，所以他们根本不用担心会被驱逐出境。这些起声援作用的组织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才不必将发表公开谴责作为新的首要任务。

这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性质，直言不讳或是保持沉默都是极个别的情况。在情绪化和非理性化的冲突环境里，每一个字，对于不同党派以及如果站在不同角度，都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并产生不同的共鸣。对于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组织，从过去和当今一些并不很明显的例子来看，十分注意它的措辞和所产生的共鸣是很必要的。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措辞的含义和影响力确实尤显突出。

直言不讳抑或保持沉默的适宜时机，并没有普遍适用的诀窍。在每一次做决定之前，都要认真真地研究一下实际情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当然没有理由低估公众舆论的影响力，但是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不能让步于当前对于迅速做出评判和全面谴责的渴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也将坚决地利用公众舞台来告诉世界关于许多地方受害者所处的困境，并向人民说明战争形势的复杂和不确定性，以此来促进对于基本人道状况的关注。尽管我们认识到了确实迫切需要发表紧急的谴责，但我们还是必然会毫不气馁地遵循方针。

### 一致性和可预见性

考虑到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在做出是直言不讳还是保持沉默的决定时尤其困难。不论来自公众或其他舆论方面的压力有多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切不可忽视其根本的使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时机的把握，最终要由公布于众是否能改善其所帮助人群的境况来决定。公开声明对于所提到的特定情况的影响力也许相对容易评估，但是就公开声明在其他领域而言情况也许就不是这样了。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组织而言，它所发表的公开声明的效果必须从全球范围加以估量。作为一个仅去年一年其代表就探访了位于约八十多个国家的 1900 多个拘留地点的 470,000 名被拘禁者的组织，<sup>22</sup>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考虑其针对 A 国监狱状况的公开谴责对于它探访位于 B 国和 C 国的监狱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有时人们会想出一些误导性的可选方式，诸如要么选择谨小慎微行事，要么选择讲求效率。要知道每一次谨慎行事的目的是为了提提高世界范围内的人道活动的效率，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地区。如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做不到这一点，就要好好地反省。我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表公开声明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决定就一个地区发表公开声明，那么在情况相似的其他地方也必须采取相同的步骤，即使在不同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道活动的结果会截然不同。一致性和可预见性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宝贵的财富。不论是发表公开声明还是对公众保持缄默，始终保持一致性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值得信赖的基本前提。

朱文奇 校

---

<sup>22</sup>参见“国际红十字会 2003 年度报告”，国际红十字会，2004 年，日内瓦，第 42 页。